

巴西近代史

(1889—1964年)

〔巴西〕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K777.4/1

巴 西 近 代 史

上 册

(1889—1902年)

〔巴 西〕 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英 译 者：詹姆斯·L·泰勒

新续一章作者：罗利·E·波皮诺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1213/10/21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75年·沈阳

K777.4/1

巴 西 近 代 史

下 册

(1902—1964年)

〔巴 西〕 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英 译 者：詹姆斯·L·泰勒

新续一章作者：罗利·E·波皮诺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DB/O/21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75年·沈阳

José Maria Bello
A History of Modern Brazil

1889—1964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by
James L. Taylor*

*With a New Concluding Chapter by
Rollie E. Poppino*

196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译出

内 部 读 物

巴 西 近 代 史

(上、下册)

〔巴西〕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英译者：詹姆斯·L·泰勒

新续一章作者：罗利·E·波皮诺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24 $\frac{3}{4}$ 插页：1

字数：440,000 印数：1—15,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90·30 定价：2.50元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巴西)共和国史》，作者是巴西人贝洛。美国人泰勒根据1959年第四版译成英文，改名为《巴西近代史》，于1966年出版。中译本系从英译本转译。

英译本对原著的内容和结构，都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修改。这些变动，是否有损于原著，值得存疑。

本书着重论述巴西建立共和国以来的历史，对巴西帝国的末期也略有涉及。原著者和英译者都以唯心史观从事著述和编译。书中对总统、将军等不厌其烦地予以介绍，而把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则视为无所用心和无所作为的消极因素。关于帝国主义对巴西的侵略，亦未能进行有力的揭露。但是，它对巴西近代史作了综合性的论述，其中资料较为丰富，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5年2月

英译本出版者说明

本书是贝洛所著《共和国史》第四版(1959年)的英译本,但在结构和细节方面都作了一些更动,以便使它更适用于非巴西的读者。作者论及美洲和欧洲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一般性背景资料,大部分被删去。另一方面,巴西的读者所熟悉的事件,在我们看来,却需要替非巴西的读者写得更详尽一些,并且更严格地按照年代的顺序加以排列。在作这些必要的改动时,我们不仅一直细心地保留作者所论述的事实,而且还保留了他的解释和强调的重点。总之,我们的改动,始终局限于结构和顺序方面。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至十章以及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都经过了彻底的改编。

詹姆斯·L·泰勒远远超出译者通常所承担的责任,而在学术上给了我们帮助和指教。罗利·E·波皮诺教授异常熟巧地增订第二十四章并撰写了

第二十五章。艾丹·A·凯利为使本书以现有面目出版,设计和完成了综合编辑方案。为此,我们愿意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我们也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所属的拉丁美洲翻译委员会,他们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索引和年表由泰勒先生编写。地图是戴维·J·波利特地为本书绘制的。

英 译 者 说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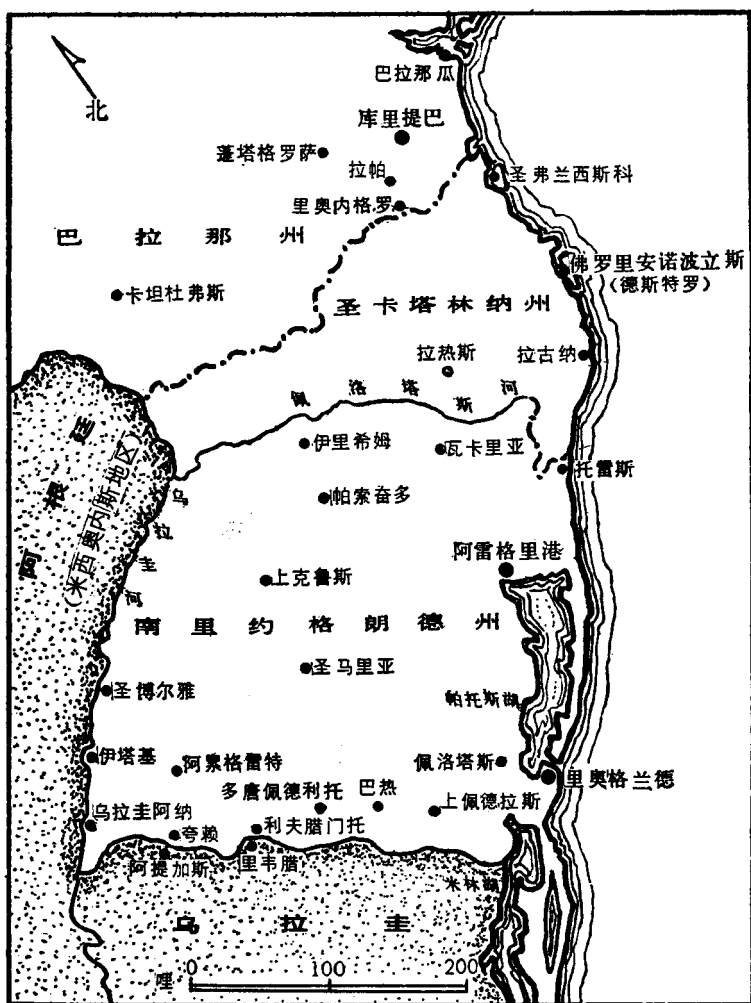
贝洛先生的这本书，受到他本国同胞的欢迎，已经出了好几版；这证明了它的优点。这个英文译本如果也有什么优点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正如出版者说明所提示的那样，这个译本对原文作了通篇的修订、补充、注释、删节及移动，并且在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五章里，增加了波皮诺教授对1946年以来历次事件所作的无与伦比的论述。我们的努力，一直是为了使本书尽可能地有益于那些对巴西历史了解得不多或者完全不了解的英文读者。

完成这个译本的整个过程，说起来倒也很有意思。我首先比较拘泥字义地译出了原文，理顺了佶屈聱牙的文句，将叙述历史事件所用的现在时态改为过去时态，删除了各种离题的闲话，又补充了极少的注释。然后由斯丹佛大学出版社的艾丹·凯利先生进行编辑，并交给我进行校对，附带向

我提出了在编辑方面各种可以想到的疑难问题，其中有一些，是我从可供我利用的资料中找不到答案的。未经编辑加工的原稿，由波皮诺教授读过，第一次校样由凯利先生和我自己校阅，第二次清样是我和出版社的J·G·贝尔先生校阅的。尽管每个步骤都查出了一些错误和不够贴切的地方，然而，遗留下来的，当必还有很多。

对索引问题，简单说几句。众所周知，按照巴西人的习惯，在提到别人时，有各种叫法，唯独不用他们的全名，这样一来，给一本关于巴西的书籍作索引的人，就遇到了一些取舍上的困难。例如，在本书里，1893年海军叛乱的领袖，通常被称为库斯托迪奥·德·梅洛，但是贝洛先生又称他为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海军上将梅洛、或者只叫库斯托迪奥。除去少数例外（我把它们互相参照地列入索引），对于所有的姓名，我都自作主张，按照作者最常用的名字的最后部分，加以排列，如：梅洛，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有时将省掉的部分添写在括弧里。我保留了作者对全部专有名称的拼写法。

詹姆斯·L·泰勒



地图 1. 南里约格朗德地区 (书中所提各地方位示意图)



地图 2. 里约热内卢城，前联邦区，现属瓜纳巴拉州

作 者 序

摘自第一版(1940年)序言：

为一个存在至今刚刚够半个世纪的政体写历史，未免有些操之过急，因为对问题的观察还不能充分地放开眼界。时间还没有用它的古香古色，给一切事物都加上那种诗意朦胧的润饰，使那些去今遥远的事件和人物，甚至于细小的事件和平庸的人物，都变得悱恻绮丽，楚楚动人。巴西的历史画面令人感到单调，其中那些端庄守法的人物，超群出众的真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在共和国的初期，弗洛里亚诺·佩绍托那种两面三刀、隐瞒真实感情而心理异常的个性，才使他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

如各个副标题所示，这是一篇汇集而成的序言，内容取自本书在作者生前发表的四个版本的序言。我在辑录这篇序言时，删掉了原序中那些在本版的读者看来似乎没有多大兴味的部分。——英译者

这部研究巴西共和国时期历史的著作，是我自告奋勇，为了解我的祖国而进行的一部分尝试。从这个观点来看，这部书乃是对我其它著作的补充。我在这本书里，也如我在早期的著作里一样，力图做到真诚与客观，忘却个人的爱憎和同情，并在评价人物时，始终倾向于保持宽仁的态度。

摘自第二版(1952年)序言：

假如真有历史学这样一个明确的学术上的门类，那么，它首先就要求进行详尽的、客观的分析，至少也要达到有可能产生客观性的程度。我所写的主要是四十年来国家生活的综述，试图把我们集体活动的千变万化的表现，高度地综合起来，加以说明。因此，这也是一项评价判断的工作，它很容易出错，但态度却始终是忠实诚恳的。我没听说别人做过使巴西共和国史系统化和简明化的尝试。因此，我一向不得不到稀少的官方文件以及专题论文和小册子里去搜集资料，而它们又几乎全都浸透着时代的政治激情。各种外国书籍，虽然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当作我的范本，但却帮助我广泛地熟悉了我国国内最近发生的事件，使我更充分

地了解了祖国，从而也更强烈地热爱她，并对她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在这些书籍中我格外应该提到：D. L. 杜蒙德所著的《我们时代的美洲》（1896—1946年），班维耳^①所著的《第三共和国》（1870—1935年）和B·克罗齐^②所著的《当代意大利》（1871—1915年）。

那些编写本国当代历史的欧美作家，比起一个贸然进入同一领域的普通巴西作家来，除了有某些内在的优越条件之外，他们还有着许多外在的优越条件，如丰富的文献资料，一贯明达而宽容的读者，而尤其重要的，乃是一种思潮云涌、方兴未艾的气氛，在这种气氛里，一股股思想潜流，正在影响着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动向。对比起来，我们巴西人，也同那些和我们处境相同的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在思想意识上都十分缺乏远大的抱负。我们的一些最巨大的成就，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气味，带有迫于当时环境而临机应付的气味。……因此要在我国的历史当中，探索类似今天

① 班维耳（1879—1936年），法国历史学家。——译者

② 克罗齐（1866—1952年），意大利政治家和哲学家。
——译者

存在于美国的那种具有成熟思想的伟大路线，以及重大的利害冲突，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特别强调那些标志着共和国历史的经济变革。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且也反对唯物史观，但是在我看来，当一个人研究象巴西这样的国家时，经济事件，以及它们对政府连续进行的财政实验和一般政策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摘自第三版(1956年)序言：

关于巴西所经历的过渡和不稳定时期，我一直不得不克服许多调查研究方面的困难，方才能够找到事实论据，这些事实之中，有的杂乱无章，有的富于戏剧性，有的情节生动，简直可以入画。我曾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这本书，我说我觉得自己好象是置身于亚马孙野生密林中的一个割胶工人，他要从盘根错节、千差万别的树木里边，找到橡胶树，才会使他的努力得到报偿。哪些是主要的事实？哪些又是次要的？一个从表面上看来不大重要的事件，难道不常常因为它那难以预知的后果，而竟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吗？

我充分意识到写当代历史的作家们所冒的风险。这些风险，总不外乎是所提出的文献资料不全和直接地反映了个人的同情和爱憎。然而，对于那些打算把遥远的过去，按照本来面目重新再现出来的人们来说，在他们的道路上，陷阱是决不会很少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地超然于自身之外。总之，在历史学里，也就和其它那些被狄尔泰^①说成是“属于精神范畴”的科学里一样，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对话是永远不停的。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所做的客观判断都是相对的。例如，吉本、蒙森和费雷罗^②，同样地精通罗马史，但是他们的结论却很不相同。

我读泰恩^③所著《现代法国的起源》时，还很年轻。我同我那一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满脑子都是顽固的宿命论思想，认为作者对法国革命和

① 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年)，德国哲学家。——译者

② 吉本 (1737—1794年)，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蒙森 (1817—1903年)，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费雷罗 (1871—1942年)，意大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译者

③ 泰恩 (1828—1893年)，法国资产阶级评论家和哲学家。——译者

拿破仑所作的评价，便是最后的定论了。后来，我通过其它作家（从浪漫主义的到最现代的作家）的著述又重新读到法国的历史，这时候，我对这位老一辈的大师的信仰，便不可挽回地动摇了。别人的一些不同意见和反映，使我看清了泰恩自称是他思想“支柱”的那些概念化、机械论和根据薄弱的成份，而他的这种思想，乃是从黑格尔那里汲取来的灵感。这个教训就是：不要写历史，不管它是现代史、近代史还是古代史。从这种说法引伸出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什么东西也不要写。

与写当代历史的所谓不利条件相比，自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争议的有利条件。作者不需要进行那种困难的心理转变，去适应已经消逝了的过去的环境。他所回忆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世界，他直接经历过的世界；其中的人物，他曾经与之见面交往，或者是他们的足迹尚存；而其中思想感情的激流，也曾经同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融会在一起；总而言之，他所回忆的是他一直在其中生活的那种风土环境。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他应该把自己束缚在枯燥无味的日常新闻里。他要作出结论，进行归纳和演绎，进行解释和判断，因而，他要靠着